大学合作学习何以从“凑数”走向“出彩”?

■广州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浪英

在大学课堂里,小组作业、小组汇报、小组调研等合作学习是高频教学形式,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大学生对于合作学习的态度往往不如预期积极,部分学生对于合作学习甚至有一些怨言,时常能听到“我们组就我和某某在干活”“组内的同学都不太熟悉,小组作业沟通很麻烦”“我们小组对于作业任务各有各的想法,谁也不愿意让步,没法继续下去”等声音。一项本应激活课堂、深化认知、培养协作、促进成长的教学设计,为何反而成了学生吐槽的环节?回答这个问题,表面看是回答“要不要安排合作学习”,实质上是在检验大学教学能否在课堂微观层面真正见效。

一、合作学习“遇冷”的表现

其一是组队之冷:是“抱团”,不是“结对”。在合作学习中,学生自发分组时,宿舍、同乡、成绩相近者往往自动聚成一团,跨专业、跨观点的碰撞被有意回避。有的小组为了稳妥,宁可少一个人,也不愿拉进一位不熟的同学,担心增加沟通成本。如果教师采取随机分组方式,在后续完成合作任务时,因沟通出现问题需要教师出面解决的概率则会更大。本应是异质互补的临时学习共同体,却在熟人社会式的结团中失去了互补意义,讨论随之趋同,不同意见难以进入讨论。

其二是过程之冷:“搭便车”与“独角戏”并存。真正投入的往往只有几个人,不少成员挂名在场;分工写在纸上,落到执行常出现由组长或个别组员一人兜底的情形。群里长久的沉默,与交稿前夜的突击形成鲜明反差。有学生坦言:“我不是不想参与,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我参与。”信息不同步、责任不清晰,“合作”便停留在口头,协作并未真正发生。

其三是成果之冷:“同质化”与“套路化”。PPT模板高度相似,素材多从网络搬运,观点正确却空洞;不同小组的汇报结论惊人雷同,看不出个性思考的痕迹,随着AI大模型的普及,这种现象更甚,从任务分析到结论及PPT制作,都交给AI包办。作业交上来了,认知却没有往前推进,课堂也随之失去鲜活的学习氛围。

二、合作学习“遇冷”的原因分析

合作学习“遇冷”,并非学生天生排斥合作。不少学生在社团、竞赛、实习中表现出很强的协作能力,唯独在课堂上提不起劲。因此,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学习态度不端正,具体来看有三方面错位。

一是分组形式失当:只有分组,没有协作。分而不合,缺少角色分工、过程节点与协作规则,合作学习便沦为几个人各做各的、最后拼在一起的松散集合。在学习共同体组建时,缺少预热暖场小任务,成员之间熟悉度不够,氛围生疏。没有共同任务、没有相互依赖、没有协商的必要,合作自然不会自动发生,拉个群便成了最省事的分工方式。

二是任务设计错位:把问题探究降格为知识搬运。当合作学习任务被简化为“某章节知识点梳理并汇报”时,学生只需复制教材与网络资料即可交差,合作便失去了必要性。大学育人不止于知识的增长,更在于它指向认知深化而非信息复述。一旦丢掉这一点,合作学习任务就退化为一次“集体抄写”,投入多少与得分高低之间也失去了关联。

三是评价导向偏移:重结果,轻过程。合作学习的成绩往往以最终的展示或者报告等为评价依据,常常出现搭便车者与主力成员得分相同的情况,久而久之,认真的人也失去了认真下去的动力。评价若只看最后那十分钟的呈现,过程中投入与否、积极与否、认真与否、态度如何便没有被看见。

更深一层看,三重错位的共同根源,在于合作任务的实际操作模式偏离了合作学习的本真逻辑,长此以往,学生会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而“凑数”,效果自然不好,教师看到效果不好,也会为了完成教书任务而“凑数”,师生共同形成低质量教学循环。合作学习研究指出,把学生分成小组不等于分组任务就有效了,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源于成员之间建立起积极的相互依赖,只有当每个人都清楚“他人的成功与自己的成功正相关”,协作才会真实发生。当下许多课堂的小组作业,恰恰停留在分而不合的浅层,既没有设计出必须协作的任务结构,也缺少促发深度互动的规则与引导,自然难以唤起学生的投入。

三、合作学习从“遇冷”走向“共热”的途径

让合作学习“热”起来,关键不在于是否分组,而在于让合作真正发生。结合合作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可以从四个方面重构合作学习。

第一,重构分组:从简单组队到角色共创。研究普遍建议,合作学习小组的规模宜小不宜大,规模越大,个体表达与互动的机会越少。在分组方式上,可依据任务特点灵活选择分组方式,安排暖场小任务,让成员之间先熟悉再协作。更重要的是明确角色分工:资料梳理、访谈调研、质疑思辨、成果呈现,各角色的责权利清晰,必要时可采取轮流负责制,形成人人在场、人人有责的合作学习氛围,才能人人有收获。

第二,重构任务:从概念复述到解决真问题。从预期的学习效果出发,倒推合作学习的具体任务安排,通过反向设计达成有效学习的目标。合作学习任务结构化,摒弃简单机械分工式任务,布置非协作不可完成的复杂问题。选题贴近学生的真实困惑与生活场域,围绕校园现象、网络舆情、社会热点等设计带有开放性的探究任务。例如,把“如何看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转化为“观察记录校园公共空间的使用冲突,分析其成因并给出治理建议”,把合作学习任务从复述概念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过程。

第三,重构评价:从结果评价到过程增值。评价应建立“过程、主体、内容”多维框架:在过程维度,收集小组讨论记录、阶段成果与反思日志;在主体维度,综合教师评价、组间互评、组内互评以及个人自评等,给出可追溯的个人得分;在内容维度,既重视产出的结果,也注重过程的能力增值。配合及时反馈机制,让“搭便车”失去空间,让每一份投入都被看见。评价的指挥棒变了,学生的行为才会跟着变。

第四,重构场域:从教室空间到真实情境。依托校地协同、企业实践、乡村调研等真实场景,把合作学习任务放进现实生活。广东实践场景丰富,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线到县镇村基层,都可以成为合作学习延展的真实场域。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分工、协商、共创,收获的不只是一份作业,更是认知、思辨与能力的有效提升。

大学合作学习的“遇冷”,表面是教学设计问题,深层是育人观念的转变。合作学习不是机械的“凑数”式教学方式,而是“出彩”式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大学课堂的吸引力,从来不只靠讲台上的精彩,也藏在一个个细小的课堂实践安排里。这或许正是合作学习落到课堂层面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注脚:让大学育人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AIGC红色影像赋能思政课建设的研究

——以AIGC红色影像《山河应许》为例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瑞希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从技术和媒介两个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也为新时代思政课的数字化改造和创新增添了新的发展机会。2026年五四青年节,沂蒙青年团队创作出的AIGC红色影像《山河应许》,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发布,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共鸣。探究AIGC红色影像的育人逻辑与优化路径,对推动思政课建设、提高红色文化传播的实效性有着重要意义。

一、AIGC红色影像的思政育人逻辑

(一)场景重构:奠定主体间对话的信任基础

AIGC红色影像可以促成场景的感知化重构。在场景中,史实细节不再是零散地陈列,而是在方方面面、层层铺展中不断加强叙事的可信度,也使得受教育者不再只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渐渐成为主动的探索者。《山河应许》在重现1960年许彦丈量沂蒙水利的情境时,不只是把当年使用的测量工具展示给观众,更借助环境音效模拟、光影动态渲染等手段打造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数字技术生成的具身感知体验让红色历史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字和静态图片上,而是变成可以切身体会到的具象真实,遥远的红色历史也因此变得可感、可触。

(二)人格唤醒:构建教育的双向对话

AIGC红色影像的叙事设计,更突出人格对话的平等感。《山河应许》通过AI技术让人物用自己的话讲自己的故事,正如主创者所说的“让青春自己开口发声,让榜样自己诉说初心”。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红色人物仿佛在与当代青年面对面交流,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价值追求。影像还通过AI技术,用统一的视觉风格呈现不同时代青年的物品,形成青春传承的线索,凸显青年群体的共性追求。受教育者在观看影像时,会自然地将红色人物的人格特质与自身进行对照,在他人人格中看到自我人格的潜在可能。

(三)情感共振:激活主体间的心理联结

思政课的提质增效,离不开新兴数字技术对内容生产的创新,也离不开影像载体打通情感传播链路。AIGC红色影像依靠精细化的内容处理,捕捉并传递红色精神中的情感内核,再通过构建共通的代际共鸣,让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强烈的情感共振。例如,《山河应许》创作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画面质感、配乐氛围、叙事节奏等各方面进行统筹,有效地避免了传统影像中情绪表达单薄、场景切换生硬、氛围割裂等问题,使观众身临其境地参与到故事中,去体会背后蕴含的红色意蕴。这种情感产生与接收逻辑,为完善思政课情感教学模式、加强课堂价值传递效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AIGC红色影像长效育人优化路径

(一)严守史实底线,筑牢红色叙事真实性根基

在影像生成阶段,AIGC红色影像应当把权威史料当作内容生产的核心支撑。《山河应许》的创作团队深耕党史文献、红色档案,将一手资料作为AIGC模型训练的素材,从源头上保证生成的人物形象、事件细节都能追溯到明确的史实依据。

审核环节是保障内容真实性的关键屏障,教育主体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审核机制。一方面,要邀请党史研究专家、历史学者参与审核,重点把关影像中的历史事件时间线、重要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等核心要素;另一方面,要由思政教师从育人视角出发,审核影像内容的价值导向与叙事逻辑,确保红色精神的传递准确无误。

(二)优化呈现效果,打造沉浸式互动形态

在AIGC红色影像的实际创作过程中,技术团队需要对画面模糊、人物表情僵硬等问题进行参数调整和细节调校。调校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让画面更加精美,更多是希望影像既能展现出历史场景的原貌,又能契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要求。在网络时代,受教育者特别是青年群体对影像内容的互动体验有着更高的期待。因此在观看影像时,教育者可以在关键的情节上设置互动节点,把影像的内容和思政的知识点结合起来,加强受教育者对红色知识的记忆与理解;在影像传播时,教育者可以引导受教育者同影像中的人物进行虚拟对话,通过交流更好地体会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涵,从而使红色精神深入人心。

(三)精准定位受众,构建多元传播渠道

AIGC红色影像的传播需要借助技术把握信息与用户之间的二元关系。不同年龄、不同身份背景的受众在上网习惯、信息需求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精确定位受众是提高传播效能的前提,教育者需要根据受众特征制定不同的传播策略。对于青年学生群体,其网络活动主要集中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娱乐平台,偏爱趣味性强、直观易懂的内容,因此在传播时需要推送短时长、强情节的影像片段;对于职场青年群体,其网络使用时间相对碎片化,因此在传播时可以借助社交平台、资讯平台,推送轻量化的影像集锦和感悟分享,使红色文化融入到日常网络生活中。

三、结语

《山河应许》的落地实践充分印证了数智技术已然不断渗入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正以不可逆转之势重塑教育生态,这为新时代思政课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工具,也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新动能。然而,技术终究是服务于教育本质的手段,而非教育的核心。数智技术的应用必须立足思政育人的价值准则与历史立场,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锚定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正确的价值导向,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强大助力,为新时代思政育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陈肇容遗失烈属优抚证,证号:LS10005,声明作废。
广东凯讼律师事务所的李静谊律师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419202511947097,执业证书流水号:12180851,现声明作废。
汕头炊烟袅袅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4MAE1FDAL6G,遗失公章(编码:4405145039983)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林时娜,身份证号:445121199305224860,遗失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护理专业中专毕业证书,证书编号:2012191010349,现声明作废。
黄鑫泽遗失士兵证,证件号码:202353110763,特此声明。
林运然遗失健康证,身份证号:440582199205102057,声明作废。
深圳市新盈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94428Q)遗失公章(编码:4403110150855)一枚,遗失财务章(编码:4403110150856)一枚,现声明作废。
深圳市博驰广告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法人姓名:陈磊,编码:16393)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深圳市宝安区德昌达机械维修部(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300L909545472)遗失印章缴销回执一份,特此声明作废。
钟永锋遗失广州公安《人民警察证》,警号:016508,特此声明作废。2026年11月2日。
遗失声明:刘丽丽(AMONAVIS依我之见)遗失阳江百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开具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0004347,现声明作废。
阳江市天佑稳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江门市圣伦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MA54L4XR68,遗失印章销毁备案证明一份。特此声明。

跑政通:
全国登报、公证认证、公众号迁移、AAA信用认证、企业信用修复,律师函代发、翻译、正规备案刻章,一键式线上办理,咨询热线:4000049919